

我 爱 书 丛 华 中 我 爱 书 丛

叁

中华国魂

江苏
少年儿童
出版社



D6-51
X1.53

《爱我中华》丛书

中华国魂

叁



一九九四年八月三十日



ZL113192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D6-51
X1.53

365846

C.
127

《爱我中华》丛书

总 主 编：孙家正

副总主编：王霞林 谈凤梁

编 委：茅家琦 薛家骥

林德宏 孙晋芳

张彦平 邵 平

李新轩 苏之轼

《中华国魂》

主 编：谈凤梁

责任编辑：张彦平 陈图麟

装帧设计：赵 清 王 冰

《爱我中华》丛书

总 序

孙家正

《爱我中华》丛书这一选题是在《中华国宝》的基础上形成的。1988年江苏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套书《中华国宝》，曾荣获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这套书的最大特点是把爱国主义教育知识的传播有机地融成了一体。沿着这条思路想开去，便逐渐萌发了编撰《爱我中华》丛书的想法。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过：“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可以说，爱国心是人类一种最高尚的情感。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爱国主义一直表现出极强的凝聚力和巨大的精神力量。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在全国人

民中，特别是在青少年中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对于培养一代又一代合格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对于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于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着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伟大的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许多彪炳千秋的英雄豪杰、志士仁人值得崇尚，有许多震惊世界的发明创造、丰功伟业值得赞扬；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曾备受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残酷压榨，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进行了可歌可泣和波澜壮阔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制度给古老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勃勃生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高，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及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因而，让广大青少年了解历史，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可以促使他们提

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起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从而增强历史责任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发奋学习,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丛书》的酝酿过程中,江泽民总书记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一封公开信发表了。这使大家深受鼓舞,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为此,我们全力以赴,集中力量,加快编撰这套包括《中华国宝》、《中华国魂》、《中华国威》、《中华国恨》、《中华国策》在内的《爱我中华》丛书。随后,新闻出版署又将这套丛书列入全国“八五”出版规划的重点图书选题。

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这套5卷、20册、300余万字、1000多幅图片的丛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华国宝》,是在原书基础上重排的彩图本,主要介绍了我国堪称国宝的足以引以自豪的诸多物品;《中华国魂》记述了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类杰出人物的感人故事;《中华国威》记述了我国在军事、体育、科技等方面能充分显示国威

的重大事件；《中华国恨》记述了旧中国遭受侵略者的欺压、掠夺、凌辱的悲惨历史；《中华国策》则用大量生动的事实说明了我国当前及今后治理国家的基本国策。每一卷都有突出的中心，鲜明的主题，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爱憎分明的炽热感情。

需要说明的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是极为广泛的，远不止这5个方面。特别是当前，为了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同心协力、意气风发地奋斗着；为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奉献着自己的赤子之心。其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值得宣传，有许多先进人物值得赞扬，希望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更多的素材，编撰出更多更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读物，一起把爱我中华之歌奏得更响。

爱国 进取 务实 奉献

——《中华国魂》前言

谈凤梁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世界上有着五千年以上历史的四五个文明古国,有的早已消失,中国却绵延至今。虽然在1840年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由于政治的腐败,经济的落后,中国受尽了列强的欺凌,但中国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历尽磨难之后,获得了新生。这是什么原因呢?除掉中国的社会和自然条件以外,主要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人民,具有不可战胜的中华国魂。

中华国魂是什么呢?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博大精深、人才辈出的逐步凝聚而成的多民族国家,要想用三言两语作出概括,实在难以做到。但是,既要编撰《中华国魂》,也就无法回避这个难题;否则,就连选目工作也无法进行。基于此,也仅仅出于这种需要,我们开展了多次讨论,从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化艺术和道德风尚等几个方面努力探求,大家不揣冒昧,不怕挂一漏万,觉得似可用爱国、进取、务实和奉献来加以概括。

从政治经济方面来看,中华国魂首先表现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生存、团结和统一。秦始皇固然残暴,但以他为首的统治集团,客观上顺应了历史潮流,横扫六合,统一天下,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郡县,统一度量衡,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的制度,从而使四海一统,逐步趋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虽属少数民族的领袖,但是他雄才大略,胆识过人,在统一蒙古和远征中亚的事业中耗尽了精力。为了维护中国的统一,历史上有很多英雄对外反对侵略,对内平定叛乱。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统一的行动有时表现为战争,有时表现为融合。在日渐融合的过程中,各兄弟民族之间,固然有见贤思齐、互通姻娅等佳话,但受少数统治者的挑拨和蒙蔽,往往表现为在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唆使下的白刃格杀。一旦为政者平等待,干戈就很快化为玉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便迅速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次,在政治经济方面,中华国魂表现为维护主权和人民利益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戚继光,面对倭寇的入侵,毅然训练家兵,与倭寇浴血奋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蛮烟一扫海如镜,清气长此留炎州。”林则徐面对张牙舞爪的英国等侵略者,断然在虎门销毁了230多万斤鸦片,从此展开了近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封建社会中,国与民是矛盾的,但有时也是统一的。不管封建统治者出于何种动机,当他们体恤民生疾苦,推行爱民政策时,便升华为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唐太宗,能够从善如流,不兴徭役,从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把唐王朝推上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乃至如今侨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仍然以“唐人”自居。终生以“致主泽民”为信念的契丹族蒙古大臣耶律楚材,他救民于“屠城”,拯农于“圈牧”,遏制了蒙古族统治者狭隘民族主义的野蛮行为,调和与融合了蒙族与汉族人民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封建时代的国家观念不仅与君主王朝相连结,而且往往与某些统治者的狭隘民族主义相混淆。明明中国的发展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努力

的结果,明明大统一的元、清王朝统治者是蒙族和满族人,在中国南北分裂时为黄河流域的统一作出贡献的更有其他民族的统治者,他们中间的不少人从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作出了贡献,明明历代统治者大都敬重那些体现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和道德情操的但在当时是属于反对他们的敌人,但一旦民族纠纷上升为内部战争,在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下,对立双方往往自称为“国”,而把对方谬称为敌国。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误解,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曲解。诚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是不平衡的,每个民族都有独具个性的信仰和风俗,各个民族的统治者也难免有其偏见和野心。以强欺弱,以野蛮对待文明等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大体上也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统治者发起的民族内战决不是两国相争,也不能等同于各族人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诚然,兄弟民族之间不可能永远没有矛盾,但只要处理得当,就无需诉诸战争。即使兵刃相见,也完全可以避免殃及人民。这就是直至今今天,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仍然对三国时代的汉族大臣诸葛亮顶礼膜拜的原因所在。那么,在兄弟民族战争过程中,纵然是反对专横残暴落后的人物是否应该否定呢?不,我们认为,国家内部的各民族的纠纷,应当在相互尊重和团结协作的前提下,分清是非曲直,凡属有利统一、保护先进、造福人民(哪怕是局部)的行为,都应该肯定。至于在正义战争中赤胆忠心、宁死不屈的人物,就其道德品格而言,就更应该予以褒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苏武、岳飞、史可法等的精神理当继承和发扬。为什么清王朝开国之后,尊重的是史可法等誓死反抗他们的人物,而不是屈膝投降的洪承畴之流,其原因就在于史可法等的气节,部分体现了中华国魂。更何况清初统治者虽然对统一中国有功,但他们夹杂着严重的狭隘民族主义,在统一的过程中,动辄“掳掠”、“屠城”,杀戮了大量无辜的汉族人民。第三,在政治经济方面,中华国魂表现为强烈的革命精神和改革精

神。为了反对商纣王的暴政，周武王顺乎人心，发动了一场革命，建立了周王朝，使中国的奴隶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秦代末期的农民陈胜、吴广，决心反对秦二世的残暴统治，以勇敢无畏的精神，揭竿而起，为后代无数次农民起义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从阶级属性来讲，周武王是奴隶主，陈胜、吴广原本是农民，但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的代表，也不管是主观动机还是客观效果，只要他们能够提出和做出超过革命对象的主张和业绩，就会推动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这也就是革命。反之，就只能称反革命。历史已经证明，革命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改革也能发展生产力。春秋时郑国的子产，实施田亩和军赋改革，铸刑鼎，立法规，不毁乡校，从而使郑国由弱而强，由乱而治，增强了国力，改变了倍受欺凌的局面。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张居正，针对北宋末期与明代中叶的颓败现象，锐意改革，“心力唯在富强”。王安石竭力推行“熙宁变法”，虽然因客观原因而未能取得明显成效，但在他担任地方官吏的25年中，改革的措施却获得了局部的巨大成功。张居正发扬实干精神，推行“一条鞭”法，使明代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革命与改革两相比较，前者往往以军事形式出现，后者则表现为政治斗争。应该说，两者的矛盾都是尖锐的。但战争可以摧枯拉朽，用武力荡涤除思想以外的一切污泥浊水，而封建时代的改革只能仰仗于实绩和权势，传统的旧势力往往会祭起“祖宗成法”来抵制，既得利益的权豪势力也会利用他们的权力和手腕进行反抗，一旦改革失去最高统治的支持，就会顷刻失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比革命的难度要大得多。如果说，王安石的变法纯粹是中国货的话，那么，在中国近代史上，改革往往包涵着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等的內容，这就涉及到爱国还是卖国的命题，所以难度就更大。为什么清朝末年多少带有变革意义的洋务派、维新派和君主立宪派等统统都未能获得成功，根本原因固然

在于没有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但在当时,哪怕一鳞半爪地学习西方的提法和做法,都有可能遭到“敬天法祖”的“国粹”们的反对,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十多年前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经济就飞速发展?因为我们既反对侵略,又乐于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某些管理经验;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反对盲目排外和闭关锁国。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不是康有为、梁启超、李鸿章等清代末期的官僚士绅们所能比拟的。事实上,李鸿章之流所搞的“洋务”是包涵着卖国的内容的。质言之,旨在造福人民和维护民族尊严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是中华国魂的集中体现。唯其如此,纵有千难万险,它最终必定会取得空前的成功。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汉、唐、元王朝等的朝野有识之士,都是能够坚持既维护国家的主权,又兼收异域他邦的长处的,唐王朝就与亚洲大部分国家以及欧洲、非洲开展了广泛的文化和经济交流。菠菜、鸵鸟、治疗痢疾的药物、眼疾开刀手术等就是那时候从尼泊尔、阿富汗和古罗马等国传入中国的。应该说,反对侵略和开展中外交流,坚持民族传统和洋为中用,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如果执其一端,就会影响国家的发展。第四,在政治经济方面,中华国魂表现为勇于征服自然的精神。在阶级社会中,对待自然灾害的态度,往往表现为一种政治行为,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任何发明创造,无疑会造福人民。四千多年前的黄河、长江流域,“洪水溢流”、“四海溟溟”,大禹奉命治水,他沿着黄河、长江、济水、淮河,进行实地考察,一改他父亲鲧治水的“堙”法而为“导”法,栉风沐雨,公而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它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以及诸如张衡发明浑天仪,郦道元编著地理科学著作《水经注》等,无不在认识客观、征服自然、推动政治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与政治经济相适应,在上层建筑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领域同样充分表现了爱国、进取、务实和奉献精神。就其具体形态来说,

哲学家、思想家们都崇尚统一和爱民、唯物和辩证的思想。从周公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到儒、道、墨等家的“仁爱大同，修身救世”、“兼爱非攻，绳不挠曲”，无不强调统一和爱民。反对虚妄，提倡真实的汉代思想家王充写出了杰出的唯物主义著作《论衡》，南朝思想家范缜，针对佛教盛行、灵魂不灭的唯心主义倾向，公开写出了批判佛教，反对神不灭论的《神灭论》，理直气壮地宣传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法家的集大成人物韩非，总结了前辈法家人物的思想，集法、术、势为一体，建立了讲公平、平等的法家思想体系，他认为历史不是往复循环，也不是今不如昔，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善于透过所谓“乱世”的现象，看到历史进步和发展的本质。他甚至从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方面来分析历史发展的轨迹，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边缘。无论是韩非，还是王充、范缜，他们的思想精髓都是求实，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在文学艺术方面，大凡历史上优秀的文学艺术家，全部用生动的形象表现了爱国爱民和忧国忧民思想。他们有的用浪漫主义笔触抒发了美好的理想和炽热的感情，有的则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塑造了一系列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典型形象。战国时代的屈原，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抒情诗《离骚》，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爱国爱民、矢志不移和求学不止、永不妥协的精神。“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成为千古绝唱。唐代的“诗仙”李白，胸怀大鹏之志，热爱祖国，关心人民，在其《上李邕》、《古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塞下曲》、《丁都护歌》等诗篇中，充分表达了他的理想与爱憎。“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诗圣”杜甫，虽然一样具有屈原、李白那样的崇高精神，但他是用“诗史”般的现实主义的诗行来反映现实及其理想的。他的“三吏”、“三别”等诗篇，写出了任何一部书中都查找不到，但却是真实的劳动人民的血泪史。清代的曹雪芹，运用“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方法，也即虚构和典型化的方法，通过以贾府为主的几

个封建家族的衰败过程的描写，揭露了封建末世地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预示了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趋势。从《红楼梦》所自然流露的倾向来看，曹雪芹无疑是一个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忧国忧民的伟大思想家。除文学以外，在美术、书法、音乐、舞蹈、建筑等文化领域中，凡属成就卓著者，无不包蕴着实干、苦干，积极创新，乃至爱国爱民的精神。

作为“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中华民族在道德风尚方面有着与政治和思想相协调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对道德范畴的归纳有“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真、善、美”等多种多样。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只有具有笃行进取、忠贞节义、诚信仁爱 and 公正廉洁等优秀道德的人，才称得上情操高尚、人格完善，才能体现中华国魂。上面列举的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人，差不多都是具有笃行进取等道德品质的。他们或是从小注意“修身”，然后身体力行，在政治等方面建立了功业；或是在投身社会之后，不断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在为国为民的经历中闪耀着道德和人格的光彩。就笃行进取而言，有恪尽职守，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物；有正视困难，像勾践、司马迁那样“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忍辱负重、发愤著述的人物；有敢于迎接困难，像张骞、郑和那样出使西域和下西洋，开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人物；有闻过则喜，知过必改，如唐太宗、周处那样提出“以人为镜”和为民除害的人物；有万难不屈，拼命硬干，像海瑞那样冒死直言，备棺进谏的人物。他们对己对事，尽心着力，唯真理是从。就忠贞节义而言，有身处敌国异域而“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苏武那样的人物；有宁赴国难，拒不投降而死守睢阳的张巡、许远那样的人物；有关心国事、反对权奸的周顺昌等五位平民；有被称为“鉴湖女侠”，决心充当为革命流血的中华妇女第一人的秋瑾；有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少年英雄夏完淳。这些人物，忠于民族利益，在国

家变难中，毅然挺身而出，表现了崇高的气节。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念往往是与帝王联系在一起的，当帝王与人民面对共同敌人的时候，爱国和忠君就彼此一致，如果违背人民利益而屈从帝王，则无忠贞节义可言。再说诚信仁爱，有父慈子孝、尊师爱生如陶侃、左光斗等。陶侃尊母训而不贪，左光斗爱怜史可法胜过亲生儿子。有兄友弟恭如姬发、姬旦的。周公竭力扶助乃兄周武王及其侄子成王，固然着眼于江山社稷，但也溶进了手足之情和兄弟之爱。有从“老吾老”、“幼吾幼”而推己及人的历史人物，如深明大义，和睦同僚的蔺相如；责己严、待人宽的欧阳修；时时念着贫苦百姓、“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郑板桥。当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都必须以服从真理为前提，如果父子、兄弟、同僚之间的一方代表了反动势力，那就必须大义灭亲，进行斗争。中国传统美德的另一点是公正廉洁。无论是铁面无私、公正执法的清官包拯，穿布衣、住旧房、乘破车、驾劣马的宰相晏婴，不受贿赂，节省木屑、竹头，珍惜“分阴”的大将军陶侃等都是古今传颂的典型人物。从总体上看，上述道德范畴的四个方面，忠贞节义重在表现对国家和民族的态度；笃行进取着重表现事业的精神；公正廉洁可以视为对待名利的试金石；诚信仁爱则属于人际关系的处理原则。当然，在任何伟大人物身上，上述四个方面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作为道德规范，又总是服务于他们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业绩的。

应该说，中华国魂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它哺育和促使一代代、一批批仁人志士，为了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而前赴后继，奋斗不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国魂是打上了中华民族的鲜明烙印的。反过来看，由于历史是不断演进的，中华民族是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华国魂也有其相对鲜明的特点，它又是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不断沉积和升华的。大体说来，先秦时期属于中华民族形成的阶段，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有利于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改

革,思想文化和道德范畴的奠基和规范工作,是体现这一阶段国魂的要害所在。魏晋六朝时期是中华民族进一步融合的阶段,凡属接受先进生产关系,促进民族融合和发展民族文化思想的人和事,无不体现了中华国魂。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维护国家的大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推动代表各民族利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革,是这一阶段国魂的精髓。宋元时代,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某些民族的统治集团之间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维护统一、维护先进的生产关系和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的思想文化变成了中华国魂的主导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明清时代,凡属勇于继承统一和爱民传统,敢于怀疑和揭露封建社会,逐步倡导洋为中用和变革图强的人物,就必定成为中华国魂的体现者。到了近代,只有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的人物,才能体现中华国魂。

需要指出的是,在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不管是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由于受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们的先进人物及其光辉业绩,纵然在某些方面体现了中华国魂,但都不是集大成者,更不可能成为典型代表。只有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无产阶级才真正地代表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他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武器,对历史传统进行批判继承,把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彻底推倒,进行新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实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从而确保中国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及无数个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奋斗的仁人志士,才能把中华国魂升华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成为中华国魂的典型代表。为顺乎时代百折不挠,在领导人民推翻封建王朝以后,又不断革命,提出“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孙中山先生,被中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人民领袖和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就是中华国魂的集大成和发扬光大者。与封建社会任何

先进人物不同的是，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道德规范等方面，全方位地体现了既是传统的又是崭新的中华国魂。

在选目和编写的过程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历代的任何先进人物都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更不要说帝王将相和达官贵人，何况大家都知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解和处理原则是，创造历史的人民在“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中很少记载。时势是造就英雄的环境条件，但英雄也在很大程度上稳定或造就了时势。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就其阶级属性而言，是与人民相对立的，但开国或中兴的皇帝，来自民间或同情民生疾苦的将相，在平定叛逆、抵御外侮、战胜自然灾害等特殊环境中脱颖而出的达官贵人，他们往往得到人民的拥护，在一时一事中成为中华国魂的体现者。应该说，在高度集中或是专制的封建时代，某些举足轻重的权威人物的言论和举动，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那些主观或客观上代表人民意志的英雄，往往得到人民的拥护，并依靠人民的力量确保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顺应了历史的进程。在他们身上，程度不同地凝聚着他们所生活时代的与人民大众所共有的中华国魂。当然，像蔡伦、毕昇、黄道婆、冯婉贞等，都曾建立过丰功伟绩，在各自的经历中体现了中华国魂，但他们以布衣终其身，所以正史纵然作了记载，仍不免语焉不详。这就难以完整的形式展现他们的精神。鉴于此，我们在选材过程中，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有史可稽的确实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大人物”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我们曾经想按照对中华国魂的理解分门别类地选编材料。但事实告诉我们：魂藉体存，事中见神。如果离开了其人其事，孤立地按概念选出若干事例，难免抽象干瘪，缺少说服力。再说，历史上任何先进人物，决不是按今人所概括的某个概念或类型去生活的，他们所处的环境也是千差万别的，其所作所为又往往是政治、